

薛暮桥文集

第七卷

薛暮桥文集

第七卷

(1975—1979)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铁
责任校对：孙 蕊
责任印制：裴 刚
封面设计：吴锦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薛暮桥文集 (Xue Muqiao Wenji) / 薛暮桥著. —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49 - 5906 - 5

I. ①薛… II. ①薛… III. ①中国经济—文集 IV. ①F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9715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平阳装订厂

尺寸 155 毫米 × 235 毫米

印张 339

插页 2

字数 4718 千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00 元 (总二十卷)

ISBN 978 - 7 - 5049 - 5906 - 5/F. 5466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目 录

第七卷

凯恩斯主义消灭不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1975 年 11 月)	1
就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给顾明、段云的信 (1977 年 7 月)	9
就当前需要研究的经济工作问题给余秋里的信 (1977 年 9 月)	11
过渡时期经济领域中的两条道路斗争 (摘要) (1978 年 1 月)	16
研究世界经济, 促进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1978 年 1 月)	36
关于人民币是否必须代表黄金的商榷 (1978 年 1 月)	44
就当前需要研究的经济理论问题给胡乔木的信 (1978 年 2 月)	48
写给邓小平、李先念的一封信 (1978 年 4 月)	53
关于社队企业问题 (1978 年 9 月)	59
关于 1958—1966 年国民经济建设的情况和经验 (1978 年 10 月)	66

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经济建设事业服务	
(1978 年 10 月)	79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前言	
(1978 年 10 月)	91
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1978 年 10 月)	93
就提高粮价给李先念的信	
(1979 年 1 月)	105
根据实践经验来回顾二十多年的经济工作	
(1979 年 3 月)	107
谈谈劳动工资问题	
(1979 年 3 月)	125
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开幕词	
(1979 年 4 月)	137
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	
(1979 年 4 月)	142
再接再厉 乘胜前进	
(1979 年 4 月)	164
艰苦创业三十年	
(1979 年 5 月)	170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	
1979 年版前言	
(1979 年 6 月)	186
谈谈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1979 年 7 月)	188
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1979 年 7 月)	201
对于劳动就业问题的一点意见	
(1979 年 7 月)	212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几个问题	
(1979 年 9 月、1980 年 1 月)	219
关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	
(1979 年 9 月)	254
出访美国期间的两封家信	
(1979 年 10 月)	260
出访美国期间在斯坦福大学的讲话	
(1979 年 11 月)	264
中美经济关系讲话稿	
(1979 年 11 月)	268
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	
(1979 年 11 月)	271
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进行计划管理	
(1979 年 11 月)	281
访美观感	
(1979 年 12 月)	285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	
(1979 年)	294

凯恩斯主义消灭不了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1975 年 11 月)

听了几位同志的发言，都是材料丰富，观点鲜明，且有思想交锋，使我学习到很多宝贵的东西。我讲讲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请同志们批评指教。

许多同志都讲了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并且指出这一次危机的特点是经济危机同通货膨胀的交织，我完全同意。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究竟是偶然的、互不相关的巧合，还是有因果关系的结合？是几个学者、政客的个人主张，还是整个垄断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家、政府领导人员的共同政策？显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因此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和由此所引起的生产过剩，这一点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经济危机同货币流通互相影响，这是近四十年的事情。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的历次经济危机，都是生产过剩，竞相抛售存货，存货卖不出去，纷纷跌价，工商企业无力归还银行贷款，而且要求继续贷款，银根奇紧，许多银行、工厂、商号因此纷纷倒闭。经济危机引起货币供应紧张，货币供应紧张又加剧经济危机。

本世纪 20 年代虽然早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但各国政府还是沿用亚当·斯密的经济政策，即自由放任主义。它们认为生产本身产生需求，生产总额同需求总额必然保持平衡，政府可以不加干涉。1929 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充分地证明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导致生

* 这是作者 1975 年 11 月 18 日在世界经济研究所召开的“世界经济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原理，因而就宣告古典经济学派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

1933—1934年美国为着制止银行破产，实行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开始用政府的干预来对付经济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他制造“需求不足”、“投资不足”等类谬论，以此来说明为什么有经济危机，提倡用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来防止经济危机。这个学说实际上并不是凯恩斯一个人的发明，而是垄断资产阶级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凯恩斯拼凑一套唯心主义的“偏好”谬论，来为历来为大家所反对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制造理论根据。凯恩斯的《通论》一出世，垄断资产阶级如获奇宝，把它当做对付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

凯恩斯的信徒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把通货膨胀讲得更露骨，在他所著《经济学》中胡说：“如果恐慌一旦再度到来，议会、总统、财政部长以及联邦储备局的主席全要行动起来……他们将要使用法定的关于货币的权力来印刷所需要的货币，以便应付这次危机。”他还说：“如果这句话能在阴暗的1930年的早期说了出来，并且加以执行，历史就会有所不同了。我们的国家就会避免那次造成的恐惧与恐慌，避免使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危急状态的银行倒闭的灾害。”

在经济危机开始来临时候，用通货膨胀来大量供应资金引起物价不断上升，使工商企业不急于抛售存货，甚至增加库存，这确实能够防止生产的急剧下降。但是，从长期看，通货膨胀不但不能减少仓库中积存的物资，而且由于物价上升造成虚假的购买力，促使生产以较高的速度发展，会使仓库中积存的物资愈积愈多。到原来幅度的通货膨胀已经不能掩盖生产过剩时候，就再一次出现经济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实行更猛烈的通货膨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历次经济危机，物价总是猛烈下降。战后美国的五次经济危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危机时期物价从轻微下降发展到继续上升。下面是这五次经济危机的具体情况。

危机时间	工业生产下降幅度	物价升降
1948 年 11 月—1949 年 10 月	10.5%	降 2.9%
1953 年 8 月—1954 年 8 月	10.2%	升 0.3%
1957 年 3 月—1958 年 4 月	13.7%	升 4.0%
1960 年 2 月—1961 年 2 月	7.7%	升 1.7%
1969 年 10 月—1970 年 11 月	8.1%	升 6.6%

用通货膨胀来防止经济危机，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特殊现象，而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政策。有些同志认为美国的通货膨胀仅仅是扩军备战和侵朝侵越战争的结果，并非蓄意制造通货膨胀，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不扩军备战的日本，通货膨胀比较美国远为猛烈。下面是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1950—1972 年的货币流通量指数和消费品价格指数（以 1950 年为 100%）：

	货币流通量指数	消费品价格指数
美国	229%	174%
英国	316%	260%
法国	959%	291%
西德	776%	175%
日本	4376%	289%

在这二十二年，资本主义各国不但都在实行比美国更猛烈的通货膨胀，而且物价上升的速度一般都是愈来愈快（法国 50 年代上升较快）。以美国为例，1950—1960 年平均每年物价上升 2.1%，1960—1970 年上升 2.8%，1970—1972 年上升 4.2%。从 1973 年起，通货膨胀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物价从“爬行式的上升”变为“奔马式的上升”。下面是这两年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幅度：

	1973 年	1974 年
美国	8.8%	12.2%
英国	9.9%	19.1%
法国	8.5%	15.2%
西德	6.6%	5.9%
日本	14.8%	21.9%

物价如此迅速上升，按照一般规律，应当抢购囤积，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生产迅速发展，可是恰恰相反，在这时期竟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严重的是，这一次的生产下降是同物价急剧上升同时出现的，因此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震动就特别大，公认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有些同志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到了一个“转折点”，我同意这种看法，它正在从量变走向部分的质变。从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来看，此次危机虽然高于战后的历次危机（英国1951—1952年的危机除外），但比1929—1933年的危机还小得多。但我们不能单看工业生产下降，同时要看物价上升。如果1929—1933年物价不是猛烈下降而是继续上升，生产下降的幅度肯定不会这样大。如果这次危机物价像战前的危机那样猛烈下降，生产下降的幅度就肯定要大得多。

通货膨胀从短时期看，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生产下降的幅度。但是，正因为它能够阻止生产下降，使生产过剩不能迅速消除，而且愈来愈严重，因此从长时期看，它会加剧经济危机，还会使经济周期发生变化，在危机以后难以出现一个比较显著、比较稳定的繁荣时期。

通货膨胀决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但它能够使经济危机的形式发生变化，从急性病变为慢性病。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的几次经济危机由于实行凯恩斯的政策，危机的形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两次危机之间的周期比较短（从十年左右减至五年左右），危机爆发时候物价不是猛烈下降而是继续上升，因此生产下降的幅度就比较小。慢性病看起来不像急性病那样可怕，但它更难医治。

恩格斯早就预见到经济危机的形式可能发生变化，他在1886年写的《资本论》英文本的序言中说：“从1825年到1867年不断反复的十年一度的周期——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确实好像是在循序进行，但那不过会使我们陷入一个旷日持久的慢性衰落而令人绝望的泥沼中去。人们憧憬着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我们屡次感到繁荣时期将要到来的预兆，这种预兆也屡次化为乌有。”他并在《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的附注中说：“长期停滞加一些轻微的摆动将成为现代工业的常态。”恩格斯的这些预言虽然在此后几十年并未实现，但很可能成为今

后经济危机的共同规律。

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害的是经济危机同通货膨胀的并发症。这两种病互相矛盾，治了这个病就加重那个病。为了缓和经济危机，制止生产继续下降，就需要扩大财政赤字，增发货币或者债券，放宽银行信贷，这些措施都将刺激物价继续上升。为了制止物价上升，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采取紧缩政策，这必然会爆发“使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危急状态”的经济危机。现在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这两种恶症的夹攻中挣扎，顾此失彼，找不到一条出路。所以这一次经济危机，又宣告凯恩斯学说的破产。就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得不承认：“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相结合的情况看来是无法解决的，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适当的学说。”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经济危机比较通货膨胀更加可怕。通货膨胀受到损失的主要是劳动人民，资产阶级有可能反而多得利润。经济危机首当其冲的是资产阶级，当然劳动人民也将因此失业。各国资产阶级为着安抚劳动人民，虽然也在叫喊制止通货膨胀；但一看到经济危机，又把手立即缩回来了。1968年尼克松总统初上台的时候，曾经紧缩财政开支，企图抑制通货膨胀，结果促发了1969—1970年的经济危机。于是立即扩大财政开支，1971年度和1972年度连续两年出现230亿和232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加剧通货膨胀。1973年和1974年物价上升达到空前的速度，引起全国人民的猛烈反对。

去年福特总统上台，为着收买人心，扬言要把通货膨胀当做“国内头号公敌”。可是他的医治通货膨胀的药方还没有出笼，全国许多有名的经济专家就纷纷起来反对，声称这样必然会引起无法收拾的“经济衰退”。接着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决定要把防止“经济衰退放在最优先的地位”。1974年12月和1975年1月美国的工业生产猛烈下降，福特也不得不宣布：“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工作重点从通货膨胀转移到经济衰退方面来。”他立即扩大财政赤字，1975年度联邦的财政赤字达到436亿美元，下一年度估计将要超过800亿美元，创造美国历史上赤字的新纪录。这预示着通货膨胀即将出现新的高峰。

事实证明，通货膨胀决不是使资本主义制度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而是对患不治之症的病人打吗啡针。它确实能起暂时止痛的作用，但是

医治不了经济危机的病根，相反会病上加病。因为通货膨胀像吗啡那样也是一种毒药，它破坏资本主义市场的稳定。连美国总统福特也承认：“通货膨胀是一种可以使工业世界慢性死亡的癌症。”

现在资本主义各国的通货膨胀正在从量变走向质变。在一般情况下物价上升的速度总是小于货币增长的速度，1974 年物价上升的速度显著地超过了货币增加的速度，原因是货币和活期存款流转加速，这说明通货膨胀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次危机由于物价上升与生产下降同时爆发，使国家不可能放手采取紧缩政策。资本主义各国对这两种恶症，过去采取的政策是一张一弛，交替运用，现在已经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当然，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还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局势还没有发展到完全无法控制的地步。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从长期来看虽然互相促进，但从短期来看还可能起一定的制约作用。经济危机在一定的时期内有可能制止物价的上升，通货膨胀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制止生产的下降。事物的发展总是一起一伏，一涨一落，不会直线式地上升或直线式地下降。最近几个月，资本主义各国除英国外，物价上升稍稍缓和，生产下降也大体停止或有轻微的回升。但总的来说，物价还不是停止上升，而只是以比较低的速度上升；生产回升也远没有达到危机前的最高点。美国的物价 7 月份和 10 月份又急剧上升，日本、法国、西德的工业生产经过几个月的轻微回升，7 月或 8 月又是下降，总的来说局势还是很不稳定。

今后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几个同志的发言有不同的估计。总的来说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危机已到顶点，明年春天就有可能复苏；第二种是明年仍可能是继续萧条，在危机前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上下波动；第三种是波浪式地下降，有可能再突破前几月的最低点，类似 30 年代初期的情况。我掌握的资料太少，对此很难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我认为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从长期来看，都在酝酿新的更严重的经济危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 568 页的附注中曾经指出：“每一个对旧式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告诉我们这个“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采取什

么形式出现，但既然“对旧式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是通货膨胀，那么这种未来的危机就很可能从这一环节爆发。

我认为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这种“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很可能与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大不相同，它决不会表现为银根奇紧，物价狂跌，很可能开始于世界金融货币体系的崩溃。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货币危机，许多同志已经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材料。现在资本主义各国不但滥发纸币，短期票据的增长比纸币更快。许多国家债台高筑，仍在滥发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长期公债卖不出去，就发短期公债。到政府无力还本付息时候，公债就要跌价，政府只能滥发纸币来回收公债，否则财政就要破产。所以连西德总理施密特也惊呼：国库总有穷尽的时候，“不稳定的世界金融市场也许明天就要崩溃”。

我们不当于过于低估垄断资产阶级的力量，他们目前还能够一定程度上控制局势的发展。但也不应当过于高估他们的力量，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发展是不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个“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在什么时候爆发，可以肯定的是总有一天要爆发。如果世界金融货币体系崩溃，就将有大量的银行、工厂、商号像雪崩那样破产，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可能是很严重的。

最后我还想简单地说一说现阶段的经济危机正在引起严重的政治危机，帝国主义时期几个基本矛盾正在日益激化。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于物价猛涨和失业激增，工人生活恶化，人民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政府一个接一个地垮台。各国政府首脑都不得不承认困难严重，要求人民节衣缩食，想把危机的损失转嫁到劳动人民的头上。看来阶级斗争势必激化。

帝国主义为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压低进口原料的价格，这样会加速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团结。1973年石油输出国联合起来提高石油的价格，取得巨大的胜利；现在正要求提高其他产品的价格，并提出要建立“国际经济的新秩序”。帝国主义已经再不能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

帝国主义各国同时爆发经济危机，都在奖励输出，限制输入，企图互相转嫁经济危机，因而矛盾重重，每一次国际经济会议都是争论不

休，毫无结果。

经济危机的发展必然要进一步加剧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引起剧变。当经济危机发展到使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资产阶级可能铤而走险。但现在人民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团结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 30 年代，革命的力量也在不断增长，帝国主义各国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

后记：1975 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决定各国货币与黄金脱离关系，货币发行可以不受黄金储备限制，有可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这时凯恩斯主义就受到严重的考验。1979 年 10 月我去美国访问，看到凯恩斯主义者和代之而起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者的热烈争论。1980 年初里根政府采用货币主义学说，紧缩货币发行，尽力稳定物价，不惜因此而冒生产萎缩的危险。从此以后，西方国家逐步进入“滞胀”阶段，力求在生产的低速度增长和物价的低幅度上涨之间保持平衡。

1990 年 6 月

就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给顾明、段云的信

(1977 年 7 月)

顾明、段云^①同志并报秋里同志：

6 月 27 日，我和计划组柳随年同志、统计组李成瑞同志、财政组季龙同志、经济研究所王向升同志和何建章同志等开会，讨论了如何开展经济研究工作。看到秋里同志对我们研究计划草案所写的：“所提意见很好”的批示，大家受到很大的鼓励，表示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会议中大家讨论的问题很多，主要有农轻重的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等等。大家感到这些方面的问题很多，必须好好研究。

我国经济工作人员遵循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计划”的教导，对农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视的。农业生产除 1959 年、1960 年受灾减产外，几乎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增长速度很小，只稍大于人口增长速度。1975 年全国按人口平均每人只有粮食 619 斤，比 1952 年的 570 斤只增长 8%。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较多，农村人口的口粮不但没有增加，而且是减少的，从 1957 年的 408.8 斤下降到 1975 年的 381.8 斤。从 1952 年到 1975 年，每人平均棉花从 4.5 斤增加到 5.2 斤，增长 16%。花生、油菜籽、芝麻三种油料从 13 斤下降到 8.7 斤。显然，这样的增长速度是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是不能适应在本世纪内实现两步宏图的要求的。

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从 1952 年到 1975 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 68.5%，而农村工业品的零售价格则下降了 0.7%，工

^① 顾明（1919—2008），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段云（1912—1997），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编者注

农业品价格剪刀差应当是缩小了。但是，由于工业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成本下降较快，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慢，成本上升，所以实际上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还是很大。根据物价组初步估算，农产品的价格还低于价值大约四分之一，通过价格剪刀差农民每年向国家提供的积累约有二百四五十亿元，比农业税三十亿元大七八倍。由于农产品价格偏低，社队从农业得到的积累太少，劳动报酬也很低。作为社队必须采取“以工养农”，“以副养农”的方针，这是工农业产品价格不合理的结果。为了解决这种不合理现象，需要大大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是，现在许多种重要农产品已经购销价格倒挂，去年国家收购粮食赔钱近五十亿元，猪肉和鸡蛋等也都赔钱。所以，如何调整工农业品价格，问题相当复杂。

此外如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是缩小还是扩大了？地区差别（城市与城市、乡村与乡村）是缩小还是扩大了？前者还难于判断，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大概在农业生产发展快的地区是缩小的，农业生产发展慢的地区是扩大的。各地区之间消费品（特别是副食品）供应的差别显然是扩大了，致使国家从经济先进地区抽调职工去支援落后地区、动员青年下乡上山遇到许多困难。

正如领导上指示的那样，为着编好长期计划，有许多政策性、理论性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看着脚尖走路很可能弄错方向，十年以后再来纠正浪费很大。但是，要做好这件事情，就要集中适当力量，以计划组为主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班子。我们建议计划组指定三四人，统计、财贸组各指定二至三人，经济研究所除现在已经确定的五个人外，还需要抽调几个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干部（可以从计委待分配的干部中物色）。各组挤出几个人搞研究，和当前的业务工作可能有矛盾，但从长远看对中央和国家计委决定方针政策会有帮助的。因此，下这个决心是必要的。

我的意见是否正确，请审阅指示！

顺致

敬礼！

薛暮桥

1977年7月5日

就当前需要研究的经济工作问题 给余秋里的信

(1977年9月)

秋里同志：

一月前能有机会和你面谈，鼓励我做研究工作，使我非常兴奋。你说还要找我详谈，我回来想了又想，想到你工作如此忙，很难抽出时间来找我详细谈话。经济工作又如此复杂，千言万语，从何说起，也是一个难题。想来想去，还是把我所想到的需要研究的问题，选择一部分先用书信向你报告。因此这封信就不能不写得比较长一点。如果你认为我所谈的问题还有参考价值，再找时间同我面谈。

我回计委将近两年，亲历了“四人帮”对经济工作的严重干扰，特别是对计委的猖狂攻击，弄得几次计划会议无法讨论计划，使全国经济工作受到严重损失。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夺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揭发批判了他们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罪行，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生产蒸蒸日上。现在全国人民的干劲是开始鼓起来了，为着把国民经济迅速搞上去，迫切要求我们把经济的组织管理工作也紧紧地跟上去。否则许多机关、企业、职工有劲无处使，使了劲也收不到显著的效果，这样鼓起来的干劲也不能持久，更难继续提高。

国家计委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全国经济工作的重要管理机关。过去计委机构庞大，人员复杂，“文化大革命”中下决心精简机构，调整干部，这是很必要的。但是，现在国家计委机构太简单了，同复杂的工作任务远远不相适应，以致绝大多数干部忙于日常工作，很难抽出时间来反复考虑全面的、长远的问题，也没有时间总结过去的经验，提出改进办法。像农轻重的共同发展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等重大问题，讨论多年未能彻底解决，这同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是显然不相适